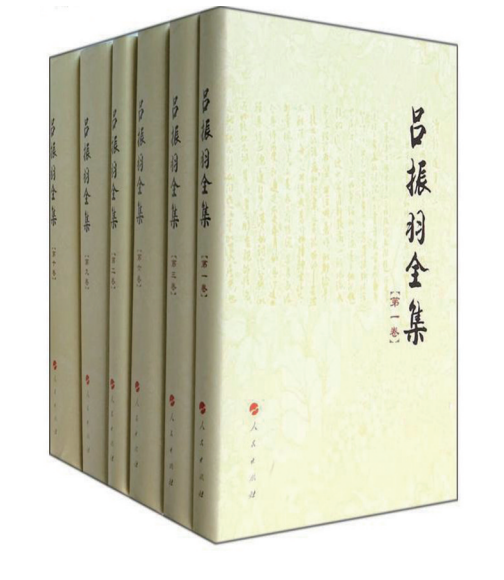


● 读者感悟

湖湘骄子 清心可鉴

——悦读《吕振羽全集》第十卷

欧阳斌



十卷本的《吕振羽全集》问世后，吕坚同志寄了一套给我，嘱我就吕老回湘日记写点文字。我乐从其命。

吕振羽先生是我省邵阳县金称市镇溪田村人。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著述丰富，学识广博，在中国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革命史以及通史等研究领域学术成果颇丰，并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等诸多问题，提出过具有开拓性的真知灼见。

为了纪念吕振羽先生，经过十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多年编辑，2014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套约600万字的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图书《吕振羽全集》十卷本，收录了吕振羽先生大部分著作。其中第十卷主要包括《回忆录》《学吟集诗选》《日记》《书信》《吕振羽生平著述活动年表》等，较为全面地再现了吕振羽一生的治学轨迹和学术贡献。

史学，可以理解为时间的科学。中国人历来重视史学，把历史教育、历史记录当作大事来做。历史讲究真实，讲究客观，所以记录历史的人应具有纯粹的品性，独立的人格。历史上齐太史“身膏斧钺”，齐南史秉笔直书等等事迹，皆可明证。

关于吕振羽先生的历史地位，今年5

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在长期探索中，产生了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吕振羽先生就是被提到的名家大师之一。作为一名爱好历史学的湖南人，我为此甚感自豪。阅读吕老回湘日记，我除了对他的勤勉和笃实心怀敬意之外，还生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喜。

从1962年10月起，时年62岁的吕老在日记中记述了回湘往事。他提到，应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邀请，参加11月在长沙召开的王船山学术讨论会，李达同志专此写信并委托王兴久等同志来京面邀。他记述，11月17日飞抵长沙出席会议，夫人江明及秘书王树云同行，住湖南宾馆。他还记述：省委副书记周里看望他和李达、潘梓年。11月18日下午2时，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他作为会议的党组成员在会上讲话。11月19日，他到小组讨论听一组林增平等发言。25日，抵韶山，谒毛主席旧居并留影。26日，王船山学术研讨会闭幕会上，他作了总结。12月3日，他与谢华在省委宣传部报告会上演讲。12月6日下午，他解答刘梦华归纳史学会提出的6个问题。

这里面提到的周里、王兴久、林增平、谢华、刘梦华等，我在少年时都曾见过，因为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林是父亲的老师，谢、王、刘是历史所、哲学所的领导。我还依稀记得见过父亲为这次学术讨论会写的一份论文手稿以及父亲陪潘梓年等参观韶山，在毛主席旧居前的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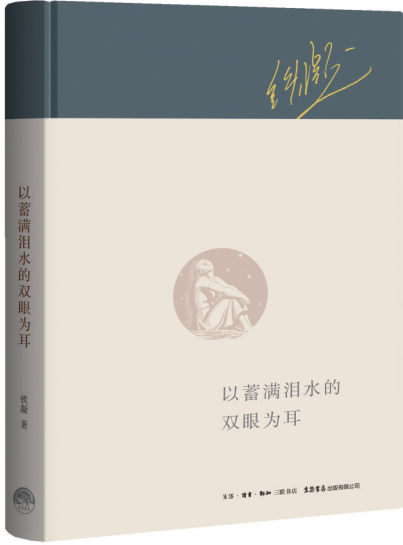
在接下来的日记里，吕老提到，周里副书记提出请他回家看看，并特地派湖南师院院长刘寿祺等陪同。这是吕老建国后第二次回乡。在日记中，吕老记述：12月11日下午到达邵阳，与谢新颖见面；至邵阳师范专科学校，与教师座谈；12月13日抵高沙，住武冈，见迟维景；次日午饭前听曲铎介绍；12月22日上午见李荣中等。在这期间，吕老本着实事求是精神，特别关注了各地的农业生产和塘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解放后相关政策落实情况；也体

现了文人的家国情怀，拜谒毛主席旧居、访问王船山故迹，经过旧时熟悉的法相岩、陡石潭等地，都赋诗抒怀，可见其对家乡的感念。遍观吕老回湘日记，所到之处，都曾印下我生活的足迹；所见之人，我也在青年时期多曾见过。其间的故事就更多了。吕坚同志嘱我读此篇章，令我暗自称奇，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爱因斯坦的“量子纠缠”一说。

限于篇幅，我难以描述阅读过程的全部亲切和欣喜，却不能不极为敬佩地介绍，在吕振羽先生去世后，其家属将他辛苦收藏的数万册古今书籍捐献给吉林大学。据相关人士统计，捐赠的这批藏书总数为3432种，25386册。其中，如元大德本《大宗地玄本论》、明万历套印本《孟子》、明毛氏汲古阁本《陆放翁全集》及傅山等人的字画及金石拓片、乾隆帝御笔诗等等，极具历史价值。今天，如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可以说价值连城。然而，吕老的家属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吉林大学为此在长春和北京两地分别建立“吕振羽纪念室”，用来纪念吕振羽先生和保管这批珍贵的书籍，既让这批珍贵的书籍得以完整地保留，又让后人永久地铭记吕老的功绩。

去年冬天，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专程到北京的“吕振羽纪念室”参观。当时，吕坚向我介绍：1942年毛泽东主席在致刘少奇、华中局的电报中明确说到，调抽吕振羽、贺绿汀等高级文化人去延安从事学术研究，因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可能，不如来延安成就较大。我听后感慨良久，当场留下了“湖湘骄子，清心可鉴”的后学心迹。吕坚同志提到，希望和湖南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续编一本纪念文集，我和张智军等同志商量后欣然应邀。此举既包含了对吕振羽先生的深切追念，也包含了对吕老亲属无私捐赠行为的敬意。

“从知学海无涯涘，惟解平生苦斗功。”这是《吕振羽全集》后记中引用吕振羽先生的一句诗文。今天，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吕振羽先生锲而不舍地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自我写照。



大的中国图书是哪一本？铁凝回答是《聊斋志异》。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生活在同样也很压抑的中国清代，他却有那么神异、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狐仙鬼怪实在是比人更像人。她们的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为铁凝当时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有趣味的、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这种阅读的感受，沉入铁凝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

铁凝出版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呢？她在自序中说：“文化应该是一所教导谦逊的学校，它终生教导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并且有能力欣赏他者。谦逊并不是自卑，它内含着开放、自省与自信，当我们有能力与不同的文化相互凝视和倾听的时候，这凝视和倾听会唤起我们对自身新的发现，对世界不断的追问，对生活永远的敏感，对人类深沉的同情心和爱，唤起我们在斑驳的现实中积蓄明澄而乐观的能量。”当一个写作者准备把它们献给读者时，至少先应有一颗不掺假的心。此刻，跟随真诚的铁凝，走进散文园林，享受阅读快乐，采集人生营养，种好真善美的心田。

● 文本细读

《一句顶一万句》： 穿透国人灵魂的现实力作

吕冠兰

根据刘震云原著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以来，以其强烈的写实性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受到观众的好评。

小说故事发生在河南延津县，共分上下两部。上部为《出延津记》，讲述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河南延津，有一个叫吴摩西的中年男人，他在寻找和人私奔妻子时，却意外和养女巧玲走失。在打听到巧玲被拐卖山西之后，义无反顾走出一辈子生活的故乡延津。下部为《回延津记》，故事的主角换成巧玲的儿子牛爱国，他为了寻找和人私奔的妻子，又回到延津。

当然，从这一出一回便可看出刘震云的良苦用心。《圣经》中有《出埃及记》，讲述圣徒摩西在上帝的感召下，带领被奴役的西伯来人逃离埃及，前往迦南地的事迹，他也因此被称为犹太人的民族领袖，在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一句顶一万句》，用《出延津记》和吴摩西之名，则是向《圣经》和摩西靠拢，虽说吴摩西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但他的象征意义不亚于犹太人摩西，他的出走，其意义也和摩西带领西伯来人走出埃及相当。摩西用四十多年的时间，才让西伯来人到达理想之地，而吴摩西和其外孙牛爱国这一出一回之间，也差不多是这么长时间。

当然，《一句顶一万句》的重点不在于祖孙二人跑了媳妇，它讲述了一个深刻的

道理，那便是人活在这世上，要找一个“能和自己说上话”的人多么艰难。事实上，吴摩西和牛爱国的媳妇不愿意和他们再过下去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闷，属于那种“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的类型，跟他们过日子着实无聊。吴摩西和牛爱国不爱说话，那是他们自己的原因，和人聊不来，哪怕是自己媳妇。所以，他们才对“能和自己说上话的人”那么重视，吴摩西丢了养女像丢了魂一样，原因便是巧玲是唯一能和他说上话的人。牛爱国也是如此，每年他都要去山东乐陵一趟，和自己十年前的战友曾志远相会，俩人坐在无人的荒草坡上聊上几天几夜，然后牛爱国才乐滋滋地回家。

不仅吴摩西和牛爱国，巧玲、卖豆腐的老杨、喊丧的罗长礼、杀猪的老曾、老曹，老曹的好友老韩以及侯宝山杜青海这些人，其实都在寻找能说得上话的人，只不过他们寻找的方式不同。

有用的一句能抵得上没用的一万句，所以，“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道出了中国人活着的苦闷，默默无闻地活着，默默无闻地死去，连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都没有，何其落寞，何其悲凉。然而，却如此这般一代又一代。每读一遍《一句顶一万句》，便有一遍的感悟，也有一遍的感伤，那感伤，足以让人为之泪下。

● 暇观亭书话

郑逸梅与《南社湘集》

年世墨

《南社湘集》是南社解散后，偏居长沙一隅的南社社友出的一个刊物。1924年11月出版第一期，线装，瓷青色封面，每册定价一元，共出了八期。

第一期上刊有费公直手绘的五幅钩吻图，还有一篇《钩吻考》，3000多字，洋洋大观。不过，郑逸梅似乎对此文并不认可。他在《〈南社湘集〉的内容》一文中直言不讳地说此文“载诸诗集，有些不伦不类”。

费公直与郑逸梅同为南社社员，工诗善画，又擅长医术。钩吻则是一种剧毒植物，多产于闽粤滇黔一带。这篇文章恐怕是费公直研究医药之所得，学术价值应该是有的，又怎么说得上“不伦不类”呢？

其实，郑逸梅的话也不是没有来由。《南社湘集》第一期的导言开宗明义“本社以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为宗旨”。这从刊物内容分为文录、诗录、词录、附录四类也可以看得出来。《钩吻考》从内容上来说，不是国学；从体裁上说，也不是文、诗、词中的任何一种，放在集中确实有些不搭。小心眼地猜想一下，这是编辑碍于社友情面发的人情稿也

未可知。

就在同一篇文章中，郑逸梅又对《南社湘集》收录王闿运的三篇遗文——《湘绮楼未刊稿》提出质疑。王闿运可是一代诗坛大家，民初《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他的遗文从内容上看，符合《南社湘集》的要求，论水平也是一时之选，怎么就不该载入《南社湘集》呢？

原来南社的宗旨就是反清、反封建。南社的发起人柳亚子曾经说 he 有一个偏见，就是以人论诗，凡是接近清、袁的诗人，他是不佩服的。而王闿运既是满清遗老，又曾受袁世凯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正该是南社及柳亚子反对的对象。本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王闿运的遗文偏偏被编进南社的刊物，这里虽然可能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意思在，但认敌为友，总是不该。郑逸梅当然要说“更为不当”了。

简言之，费公直是文不对，王闿运是人不对。文不对，还只是细枝末节，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人不对，就是立场问题了，不能不爱惜羽毛。